



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 新领域与新方法

TANSUO WAIGUO JIAOYUSHI YANJIU DE
XINLINGYU YU XINFANGFA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组编

张斌贤 孙 益 主编



Exploring the New Fields and New Methods
in the History Researches
of Foreign Education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 200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 新领域与新方法

TANSUO WAIGUO JIAOYUSHI YANJIU DE
XINLINGYU YU XINFANGFA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组编

张斌贤 孙 益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 / 张斌贤, 孙益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633-8383-2

I. 探… II. ①张…②孙… III. 教育史—外国—文集
IV. G5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81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66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2007年11月4~5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学术年会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二十几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20多位外国教育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年届80高龄的我国著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吴式颖先生莅会并发表学术演讲,使大家备受鼓舞,感到格外的亲切。

此次学术年会的主题是“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学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突出地体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大量科研成果的涌现等各个方面。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而言,20世纪80年代,教育史只有1个全国重点学科,4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入21世纪的短短7年间,全国重点学科就增加了2个,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也增加到10个以上,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数,更是增长了十几倍。可以无愧地说,教育史学科为新时期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改革实践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最近若干年来,对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困惑或者说困境,我们也有着深切的感受。大家共同担忧且议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学科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的恶化。尤其在教育学一级学科领域,相对而言,教育史的生存问题确实是严峻的,至少从表面上看,课程被大量压缩、专业人员得不到补充,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我个人感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学科具有世界影响的这一思潮,致使历史学、哲学、文学等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就内部原因而言,我感到,我们教育史学界也确实存在着诸如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学术思想不够活跃、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对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状况隔膜较深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此次会议把“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作为主题,我觉得非常之好。我自己对教育史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多年来从事中国教育史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使我认识到,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对提升学科水平、加快学科发展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外教育交流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交给大会的70多篇论文,就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展示和检阅。这些论文或以选题前沿而备受关注,或以论证深刻而极富启迪,视野开阔,信息量大。说实话,两天的会议使我受益匪浅,现在有机会把其中的部分内容付诸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会议成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促成这一盛举的是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者为这次学术年会的举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后者在学术成果出版普遍遭遇困难的情况下,慨然应允将会议论文集出版,都使我们十分感动。

我相信会议的讨论话题、论文集的结集出版必将对整个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和发

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许在若干年后,当人们总结回顾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时,2007年的学术年会和这部文集可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田正平
2007年岁末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1)
关于拓展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和改进研究方法的思考	(1)
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与外国教育史课程教材建设的“新思维”	(40)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困境与超越——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功用的分析	(48)
由“破”到“立”，积极构建教育史学科研究的新范式	(62)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现状与反思	(69)
教育问题史：一种值得重视的教育史研究范式——以《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外国 大学教育问题史》为例	(76)
论外国教育史学观念的更新	(83)
现代化理论视野下教育发展史观之反思	(89)
第二部分 新史学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97)
论新史学对我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启示	(97)
新史学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转向——基于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的分析	(107)
微观史学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启示	(116)
微观史学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126)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下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视角	(136)
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取向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探讨	(141)
第三部分 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	(146)
如何理解过去的教育思想	(146)
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物研究的新视角	(154)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师观解析	(159)

昆体良的师德观研究	(166)
陆登庭筹资思想与实践研究	(171)
关于分期研究杜威教育理论设想	(177)
古德莱德的师范教育改革设想探析	(184)
略论陈鹤琴教学法与蒙特梭利教学法的一致性 & 特色	(192)
第四部分 基础教育领域的新研究	(202)
关于开展美国教师质量问题历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兼析中美教师质量问题研究状况	(202)
基于和谐:国际初等教育政策的价值趋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210)
西欧中世纪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教育	(220)
宗教文化与英国教育的变迁	(227)
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特征的思想探源	(238)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国民初等教育制度的形成	(248)
第五部分 高等教育领域的新研究	(257)
论保守性大学理想的来源、结构和发展	(257)
早期苏格兰大学的民主传统——基于与牛津和剑桥比较的角度	(266)
欧洲中世纪大学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273)
16~18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对政治近代化之推动简论——一个思想学术根基的培植角度	(283)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初探	(291)

第一部分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关于拓展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和改进研究方法的思考

吴式颖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1989年,金锵教授约我与他合作,撰写了以“四十年来的外国教育史”为题的论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4期。该文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7年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历经风雨中取得的成绩、“文革”10年遭受的灾难和改革开放后10余年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回顾、分析和总结,对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到如今,18年已经过去了。在这18年里,我国外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世纪之交,本专业的学者不时谈论起学科发展的危机,不断地对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反思。2004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9届学术年会在福建省武夷山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教育史学科一百年:历史、问题与未来”的主题提交了100多篇论文。2005年1月,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了学会所编的以《百年跨越——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历程》为书名的论文选集。其中不少文章对外国教育史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对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2007年11月学术年会在安徽芜湖举行,其主题是探讨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本文拟从教育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和教育史学科的社会功能出发,对拓展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和改进研究方法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与认识。

一、教育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和教育史学科的社会功能

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以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外国教育史是其组成部分,侧重研究外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外,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欧美各国社会和教育理论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我在这里提出要讨论教育史研究的起源

与发展和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的社会功能问题,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教育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与教育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的。作这种区分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史学科的社会功能,更有利于我们对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改进问题的探讨。

我们应该知道,自古以来,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注意到应该不断地总结自己国家教育的历史经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教育也总是在相互交往、比较和交流中取得进步与发展的,其中就包含对外国教育现状和历史经验的考察与研究。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说,我们只能从古希腊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古代东方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如何相互学习与交流的情况还不大了解,而且从古希腊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也很有价值,“因为希腊人是我们公认特别属于西方的几乎所有理想的奠基者”^[1],教育史学科在西方形成的时间也早于我国,那么,在古希腊有没有教育史研究,其情况又如何呢?

在古希腊古风时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形成了两个哲学学派,即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泰勒斯(Thales,又译泰利士,公元前624—公元前547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0—公元前546年)和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588—公元前524年)师徒3人。他们都生活在当时希腊世界中比较先进且与埃及等东方国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米利都城邦国家,因而泰勒斯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他凭借着自己对自然现象和人类日常生活、社会生产情形的观察,作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判断。根据古希腊文献记载,泰勒斯“没有从过任何老师,只是在埃及与当地的祭司们往来过”^{[2]3}。在埃及访问期间,他研究并推进了几何学,后来又将几何学引进希腊。我国学者指出,在古埃及也流行过“万物出自水”的观点。对于泰勒斯在埃及是否听说过这种观点,且这种观点是否为他做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论断提供了启示,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我们也无法作出结论。但是毫无疑问,他在埃及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这为他后来创立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学派提供了思想资料。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曾指出,米利都学派的产生“是由于希腊的心灵与巴比伦和埃及相接触的结果”^{[3]54}。泰勒斯在天文学方面也有一些发现,因此,据说在他的雕像下刻有“他是一位贤者,又是第一个天文学家”^{[2]3}的话。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被黑格尔称为古希腊“第一个教师”的毕达哥拉斯(Phthagoras,公元前582—公元前493年,一说为公元前580—公元前500年,或说公元前570—公元前490年,又译毕泰戈拉斯)的故乡是萨摩斯岛,它与米利都、爱非斯等地隔海相望。毕达哥拉斯年轻时慕泰勒斯的名,曾到过米利都,希望就学于泰勒斯。“后者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亲自教导毕达哥拉斯,从而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并劝他像自己一样到埃及游学。”^{[4]50}因此,毕达哥拉斯直接听过阿那克西曼德

的讲演,对万物的本源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540年,毕达哥拉斯到埃及游学,前后达10年左右,学习和掌握了埃及的语言文字,当过埃及僧侣,洞悉埃及的宗教思想和制度。后来,他“被波斯国王卡谟彼西(Cambysis,在位年代是公元前529—公元前521年)由埃及虏往巴比伦等地,在那里又居留了5年左右,和当地的僧侣们有过交往。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巴比伦等地居住达15年左右,因此非常熟悉当地的宗教思想和僧侣制度,接受了一系列带有宗教和图腾意义的禁忌(如禁止吃豆、吃肉等),以及一切生物血脉相通和灵魂转世等迷信观念,吸收了当地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优秀成果”^{[4]52}。公元前525年左右,毕达哥拉斯返回故乡,并到过希腊本土及克里特岛等地游历,考察法律和政治制度等。他最后选择移居希腊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克罗顿,并在这里“逐步建立起政治、宗教、哲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盟会组织”,他的学生有300人。^{[4]54}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在古希腊哲学、数学、天文学、谐音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发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他们善于继承希腊自身文化传统并吸取和借鉴埃及、巴比伦的文化教育成就与历史经验的结果。罗素在评价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时指出,“无论就他的聪明而论或是就他的不聪明而论,毕达哥拉斯都是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人对于思想界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谓柏拉图主义的东西倘若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本质上不过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罢了”。^{[3]55-65}我国学者范明生先生在谈到罗素的评价时写道:“罗素的这种论断虽不无夸大之处,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4]118-119}就我自己接触到的一项具体的教育知识而言,以前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以为曾经长期作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课程的“七艺”中的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是柏拉图提出的,后来为写《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总序”又读了些书,才知道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谐音学)已是毕达哥拉斯“盟会”(其实也可以称之为学园)中的核心学员所必须掌握的学问,柏拉图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学来的。当然,柏拉图也是善于总结本国文化教育建设历史经验和借鉴他国经验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我们都知道,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先是通过认识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人了解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苏格拉底死后12年,柏拉图到意大利对该学派的思想与活动又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并与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后一位著名代表人物阿契泰(Archytas of Tarentum,又译阿尔库塔斯)建立了友情。此前,柏拉图也曾到埃及访问。回到雅典后,他于公元前387年开办了自己的学园,学园的课程也包括“四艺”。据说,“阿尔库塔斯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学园有密切往来”^{[5]715}。可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教育思想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教育思想有继承关系。他在《理想国》中还总结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经验。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还详细地介绍了埃及人的

音乐和“寓学习于游戏”^[6]的经验。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en,公元前431—公元前350年)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漂泊海外。“他一生的重大经历是在波斯王子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兵团中服役。”^①正是这一经历,使他了解了波斯政治家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二世(Cyus II the Great, of PERSIA,公元前590/580—约前529年)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及其事业,故有《居鲁士的教育》之作。这一作品是他“写的一部劝世的历史小说,描述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的少年时期、学业和事业以及波斯帝国的建立。作者利用这一作品表述了他所设想的政体和君主应受的理想教育”^[7]。果真如史料所载,那它就是我现在所知道的西方第一部教育小说了。它以文艺形式表达了色诺芬对别的国家教育历史经验研究之所得和自己的教育理想,真是一种杰出的创造。可惜我还没有找到并阅读它。

以上情况说明,在西方,教育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一样,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和教育家对自己的国家和别国的文化教育状况、教育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与研究,其目的是提出与论证自己的教育主张,并努力将自己的教育主张付诸实践,以期建立他们理想的政治体制,改善人类社会生活状况。这可以说是教育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能的最早体现。

在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后期和古典时代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古希腊的教育实践也在各派学者相互争论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长达千年之久的“七艺”中的前三艺,即文法、修辞学以及作为雄辩术和逻辑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是在不同学派的争论和教学中逐渐形成和创立起来的,然后被智者派在雅典的教学中作为教学的正式课程确定下来。公元前392年,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公元前338年,又译爱苏格拉底),在雅典开办了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的修辞学校,他创办修辞学校的教育实践和他的教育思想对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曹孚先生在谈到伊索克拉底的时候写道:“就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方式来说,爱苏格拉底承继着智者的传统。”^[8]⁶⁴他还说:“智者派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教育领域的斗争,到后来以修辞家与‘哲学家’,即修辞学校与哲学学校之间的竞争的形式继续着。这场竞争,在希腊化时期,以修辞家的胜利而告终:不但修辞学校对青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修辞学侵入了哲学学校。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学校中就教过修辞学,这传统为他的后继者保存了下去。伊壁鸠鲁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七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6.又,这里所说的居鲁士是波斯王大流士二世的次子,被称为小居鲁士,生卒年为公元前423年以后至公元前401年。

学校一直认为修辞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有助于政治目的。斯多葛学校也讲授修辞学,但注重它的形式方面的研究。柏拉图正式宣告,修辞学是有害的,但他的后继者也不得不为修辞学开放门户……”,“通过爱苏格拉底,再通过修辞学校,智者们的教育思想与实际活动影响了后代的欧洲。我们将要看到,爱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罗马的雄辩家的教育思想,并且在罗马的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的内容与组织上打上了它的烙印”。^{[8]65}

曹孚先生所说的古罗马接受古希腊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直接影响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虽然古罗马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文字(拉丁文),但在共和时期的前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新一代的教育还主要是通过家庭进行的,其目的是将青少年培养成农夫和军人,教育的内容以“道德—公民教育”为核心,男童自幼从父亲那里受到敬畏神明、孝敬父母、忠邦爱国、遵守法律的教育,并跟随父亲受到作为农夫和军人的实际教育,文化教育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古罗马大力向外扩张,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的势力,扑灭了希腊人的反罗马运动,把地中海周围的几乎全部国家和地区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它也开始吸取比自己先进的希腊文化,并在保存和发展其本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罗马文明。古罗马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其中学和高等学校便是在希腊化时期希腊教育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最初,罗马的中学事实上是一种外国语学校:教学用语是希腊文,教师大多是希腊人,教材也是希腊文的。只是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随着罗马(拉丁)文学的成长,在罗马才出现拉丁文法学校,而与希腊文法学校并行。”^{[8]73}高等学校是依照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办起来的雄辩术学校。开始也只有希腊雄辩术学校,教学用希腊语,主要课程是学习希腊作家的作品,教师也大多是从希腊化地区和希腊本土来的修辞学家。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才建立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使用拉丁语教学,学习拉丁作家的作品。到古罗马进入帝国发展阶段,拉丁文化在学校中才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罗马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曾受到一些罗马人的抵制,他们认为,罗马的传统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引入,严重地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与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9]51}罗马的元老院不只一次用法令禁止希腊化教育,尤其是它的修辞、演说教育。这也就促使人们就如何对待希腊文化教育遗产和本国文化教育传统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古罗马的杰出雄辩家、作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在其所著的《论雄辩术》、《雄辩家》等书中论证雄辩家、政治家的教育理想时涉及了如何对待希腊文化教育遗产和本国文化教育传统等教育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他基本上接受希腊化,但要求保存罗马的道德传统,他曾说道:“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认为好的

雄辩家必然是有文化的,罗马人擅长法学,但在文学、修辞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要向希腊学习。他对希腊的一些哲学流派做过研究,也写过一些哲学著作,传播希腊的哲学思想。^①西塞罗还留下了《论共和国》、《论法律》等其他一些著作、诗篇和 58 篇演说辞,他的作品以其典丽的拉丁文体促进了拉丁文学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罗马乃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发展。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公元前 35—公元 96 年)当过律师,大约在公元 70 年被罗马皇室委任为拉丁语雄辩术学校的主持者,他是罗马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从教 20 年。退休后,他撰写了《雄辩术原理》(12 卷,约合中文 65 万字)。这是西方第一部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据说亚里士多德也写过教育著作,但已失传),其中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教学经验,也体现了他对希腊和本国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进行研究的成果。如何对待希腊文化教育遗产和本国文化教育传统及其交融和冲突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期“仍然缠绕着许多有识之士的思想。阻止希腊文化的传播正如阻止罗马传统的消失一样困难。教育领域的情形也不例外。昆体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汲取希腊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同时又力图重振罗马文化的优良传统。他既不盲目排外,敝帚自珍,又不盲目崇拜希腊文化,数典忘祖。昆体良熟知希腊的各种著作,他甚至振振有词地主张儿童开始说话应先学希腊语,然后才学拉丁语。昆体良的教育理论中也广泛汲取了希腊人的见解和经验。但是,昆体良对当时上流社会风气的腐败,上流社会青年的娇弱放荡,哲学家放言高论而不谙实事和言行不一,文学家竞相追求辞藻上的绚丽浮华,教育上的急功近利而不重质量等,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昆体良所要恢复的古代罗马传统是:俭朴、勇武、实用,这是他在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反复强调的指导思想”^[10]。这就是说,古罗马思想家和教育家西塞罗与昆体良像古希腊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一样在建立自己的教育思想时也都需要对别国和自己国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历史进行研究,熟知自己国家的文化教育状况,了解国家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他们综合教育的历史知识,通过对教育现实的了解,将对教育理论的探讨与教育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写出具有长远价值的教育著作。可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联系,永远不可割裂。早在教育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已经发挥着推动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作用。教育史成为独立学科之后,仍应发挥也一直在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

如上所述,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欧美各国社会与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的。西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教育是通过长达 300 余年(公元 14 世纪至 17 世纪前期)的文艺复兴运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文艺复兴

^① 外国古代教育史,8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 8,第 432。

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热情向往,他们从希腊、罗马的古籍中找到了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精神权威和价值观的支持,创造了新文化的起点。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同时倡导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即“人文主义在研究古典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语言和历史的考证方法。这是人文主义的重要成就。人文主义者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使命,他们发现不少古典著作在中世纪由于抄写错误和人为篡改等原因已经面目全非,令人生疑之处甚多,于是他们就尽力搜求原始资料,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考证比较,以校正后世出版的古典著作,力求从语言文字上重现古典著作的本来面目。同时,他们还从古代作者所处的社会条件出发,历史地和批判地理解把握作者的思想。人文主义要求用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去把握历史,按照过去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11]15-16}人文主义教育家无论在教育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方面都继承与借鉴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教育遗产。许多人文主义教育家都把历史列为重要课程。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比代(G. Bude, 1468—1540)在谈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甚至指出,读史“不仅使我们了解过去,也会使我们认识现在,并且常常可以使我们预知未来”,历史是“伟大的主宰”,“甚至是我们最杰出的导师”,是“诚实和高尚的人生之路”的最可靠的向导。^{[11]464}西班牙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 L. Vives, 1492—1540)也把历史知识视为“贤明之师”。英国人文主义教育家艾利奥特(T. Elyot, 1490—1546)则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能与历史研究带来的用途和乐趣相媲美”。^{[11]464}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蒙田(Miched de Montaigne, 1533—1592)的《随笔集》是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作,“差不多是整个16世纪乃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思潮和学说的汇集,是回溯整个文艺复兴的一个瞭望塔,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思想深度的一部人文主义作品”。^{[11]488}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在《蒙田随笔全集》序言中说:“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众生,林林总总;从古希腊一直到16世纪,从法国一直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今,鉴古知今,对许多人类共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特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11]505}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历史观的变化,他们对历史学科的重视,对历史学科价值与功能的论述以及他们对继承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教育遗产(个别人,如蒙田还涉及古埃及与波斯)所做的大量工作,都为教育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而在文艺复兴运动进入16世纪以后,建立在人文主义与宗教理想双重基础上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等一系列国家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又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于是,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合和交叉。与人文主义运动相比

较,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层面。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打破了在罗马教廷统治下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新教(路德教、加尔文教等)和旧教(天主教)对垒的形势。罗马教皇的无上权威不复存在,民族国家渐趋巩固。而无论是新教还是旧教都把教育作为传播自己的教义和扩大其影响的手段,竞相举办学校,在客观上都对西欧各级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外,各教派兴办教育虽然是为了宗教的目的,新、旧教的斗争还引发了长达30年的国际战争(1618~1648年),但斗争却带来了宗教宽容和17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发展,随后又兴起了启蒙运动(发端于17世纪,至18世纪得到蓬勃发展)和国民教育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得以加速发展,出现了众多教育家,如夸美纽斯(1592—1670)、洛克(1632—1704)、卢梭(1712—1778)、拉夏洛泰(1707—1785)、爱尔维修(1715—1771)、狄德罗(1713—1784)、巴西多(1723—1790)、康德(1724—1804)等,他们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教育理论或教育改革方案。文艺复兴至18世纪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这种发展对教育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提出了实际要求。专门以教育的历史发展(包括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所取得的成果的出现应被视为教育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

关于标志教育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的著作出现于何年,究竟是哪部著作,目前各国学者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根据我们的同行邓明言在其与杜成宪合著的《教育史学》一书中论述的情况,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教育史专著主要是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成果。例如:戈莱(Goulet, R.)撰写的论述巴黎大学起源的小册子(1517年出版);英国围绕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史之争写成的论著(16世纪后期);德国的米登道夫(Mittendorfius, J.)撰写的《两本关于基督教世界研究的书籍》(1567年),该书叙述了自古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史;17世纪赫尔姆施泰德大学法学家康林(Conring, H.)根据记实材料撰写的古希腊时期到17世纪的高等教育史专著《古代学术遗产》;等等。他在书中比较详细地谈到17世纪法国宫廷教师、天主教会史学家弗勒里(Fleury, A. C., 1640—1723)所著的《论学习的选择和方法》,并指出该书写作于1657~1686年,1695年此书由基布尔(Keble, S.)译成英文出版。作者在序言中指出:“若要深入了解现今的学科设置,就应追溯其本源。这样,我们方可知道它们从何产生并发展至今,了解它们是如何历经时代的变迁而归于一统的。”作者对教育原理、方法论和课程作了批判性考察,概述了希腊人、罗马人、早期基督教徒、法兰克人、阿拉伯人的教育,以及经院主义、中世纪大学、文艺复兴直至他那个时代教育上的问题。该书被认为是“在一般意义上也许是最早的

一部教育史”。^① 张斌贤在其所著的《教育史学引论》(见《教育是历史的存在》,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年出版)中也提到弗勒里的这部书,指出美国教育史学家保罗·孟禄认为它是教育史学科的开山之作。《俄罗斯教育百科全书》第一卷(莫斯科俄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在“教育学史”专条中也提到弗勒里的这部书,认为它是出现于 17 世纪末的教育史性质的首批著作之一,写作于 1686 年,书中批判地简述了教育与教学的历史发展。该文还指出,同一时期德国的莫尔霍夫(D. G. Morhof)于 1688~1692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历史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关于宗教改革运动后教育发展史的论述。但该文认为,曼格尔斯多夫(K. E. Mangelsdorf)于 1779 年出版的《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一书才可以被认为创立实际意义上的教育史著作的最早尝试,因为作者没有把教育史研究作为自在的目的,而是将它作为正确评价学校实践和教育改革建议的手段。^② 邓明言也谈到这部教育史著作,他指出:“作者研究教育制度史,目的是为抵消巴泽多(Basedow, J. B.)的新教育思想和泛爱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他在书中写道:‘要想正确地评价人们为改善教育提出的种种新建议,不仅需要了解前人在教育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知道他们对此有何见解。’因此,尽管作者的本意并不是从过去的教育中汲取有利于改革的经验,他仍被看作是德国教育史研究的鼻祖。”^{[12]314-315} 张斌贤在《教育史学引论》中还谈到德国学者乌尔里希(Ulrich)于 1780 年撰写的《德国天主教和新学校史》,指出乌尔里希希望通过完整地说明某些学校的质量和不足,从而改进和完善他所处时代学校的教学与训练方法,为泛爱主义教育运动提供有力的依据。此外,邓明言、张斌贤和《俄罗斯教育百科全书》的“教育学史”专条的作者都谈到了德国学者鲁科夫(F. E. Ruhkopf)于 1794 年撰写的《德国学校与教育史》。张斌贤写道:“这部著作力图记录德国教育发生、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和步骤。与以前的教育史著作不同,它不是单纯的传记、著作的清单和生死的记录,而是采用大量的史料,并依据文献而编纂的。它把教育的历史发展与教会、政治、文学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拓宽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13]68-69} 以上情况说明,虽然对究竟哪部著作是教育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性著作的说法并不统一,但教育史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 18 世纪后期的德国的确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且这时的教育史学科并不是由于培养师资的需要而是适应教育发展与改革要求兴起的。如上所述,曼格尔斯多夫的《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和乌尔里希的《德国天主教和新学校史》都是在泛爱主义教育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作者都是

^① 杜成宪,邓明言. 教育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13. 又邓明言此处译名为费洛尔。

^② 《俄罗斯教育百科全书》第一卷,393。

要以自己对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育现状作出的总结与判断来论证他们对泛爱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的意见。尽管曼格尔斯多夫与乌里希对泛爱主义教育运动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其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的出版都是出于要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运动的发展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了教育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对教育史作为独立学科在德国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教育史学科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的德国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欧美各国教育史学者学习和效法的楷模且与18世纪以来历史学在德国的大学受到尊重并获得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科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详细地论述和高度评价了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 Vico, 1668—1744, 亦译维科, 1725年出版其代表作《新科学》)对确立历史学题材的近代观念所作的贡献后指出:“他确实是走在他时代的前面太远了而没有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要直到两个世代以后,才在18世纪晚期的德国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繁花盛开,这时德国的思想由于它自身的缘故而达到了非常有似于维科的地步;只是到了这时候,维科的工作的特殊功绩才为人所承认。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德国学者们重新发现了维科,给他以高度的评价,从而也证明了他自己的这一学说,即思想并不是由于‘扩散’而传播的,像是商品那样,而是靠每一个国家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任何一定阶段上独立地发现它所需要的东西。”^{[14]117-118}科林武德在该书第三编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了德国学者赫尔德、康德、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及他们的贡献和他们之间如何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取得进展。科林武德指出,席勒对历史学的贡献之一在于,他指出艺术史、宗教史、经济史等都包括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14]162}看来,席勒的观点为德国当时的一些学者所接受,因为他在柏林大学的神学院已经开始讲授基督教的历史,在法学院讲授法律发展史。黑格尔从1816年在海得堡大学开始讲授哲学史,后来在柏林大学也讲哲学史。黑格尔“一生到一八三〇年共讲了九次哲学史”。^{[15]378}他死后,由米希勒(K. L. Michelet)整理其手稿、提纲和学生笔记,于1833年出版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其中涉及一些哲学家的教育活动,的确如有人认为是的那样,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堪称一部“广义的教育史”。从1825年起,“德国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兰克(L. Von Ranke, 1715—1886)开始在柏林大学任教,1834~1871年任教授。1834~1836年,他发表《16~17世纪罗马教皇的教会和国家》,1839~1847年出版《德国宗教改革史》,1847~1848年出版《17和18世纪普鲁士史》,1852~1861年出版《16和17世纪的法国史》,1859~1869年出版《16和17世纪的英国史》,均为多卷本。历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这种发展势头影响到教育学界,导致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和作为课程在德国大学的出现。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说,多卷本《教育史》的作者劳默尔(Karl Otto Von Raumer, 1783—1865)是最早在大学